

September 2016

Lu Xun's Idea of Fiction Writing and His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Qingxin W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Wen, Qingxin. 2016. "Lu Xun's Idea of Fiction Writing and His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5): pp.81-89.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5/12>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鲁迅的小说创作思想与《中国小说史略》的编纂

温庆新

摘要: 鲁迅的小说创作思想对其编纂《中国小说史略》有着重要影响。从鲁迅整理古代小说文献到具体编纂《史略》时将小说作为历史现象来解读、再到其授课意图及效果,均可证明其借“国民性批判”的视角确立“立人”思想以主导《史略》编纂之目的意图。而贯穿于鲁迅小说创作始末的“为人生”文学观,促使《史略》从小说客体的描写对象与创作主体两方面切入,以设定由写神的向写人的演进、由无意为小说向有意为小说演进等两大小说规律;“有意为小说”的提法并非完全属于文体判断,而是基于对“为人生”文学观的表现程度多寡而言。“为人生”文学观是《史略》有关古代小说之思想性论断、艺术性评判等评鹭的潜在价值标准;尤其是,认为《水浒传》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系“为人生”文学观延展的结果。

关键词: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立人; 为人生; 市井细民写心

作者简介: 温庆新,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小说史及小说文献、近现代学术史研究。电子邮箱: wen_qing_xin@163.com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辨正”[项目编号: 15FZW057]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Lu Xun's Idea of Fiction Writing and His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Abstract: Lu Xun's idea of fiction writing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hi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book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Lu Xun initially read fictions as a historical phenomenon while currying the ancient Chinese fictional writings, and his lectures on the topic showed that he intended to take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ist critique. These showed that Lu Xun's guiding idea for wri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was the cultivation of integrate men. The literary idea of “writing for life” (as contrary to “writing for art”) was reflected in Lu Xun's own fictional writings, and the idea behind the “Brief History” helped him to take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objective description and creative subject and his focus in writing was shifted from the deities to the common people and he gradually became a conscious fiction writer. The idea of “writing for life” became his criterion in judging the values of Chinese ancient novels, such as *The Outlaws of the Marsh* which Lu Xun believed to be a work about the ordinary people's life and mentality.

Keywords: Lu Xun;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cultivation of integrate men; writing for life; ordinary people's life and mentality

Author: Wen Qingxin, Ph. D., is a lecturer in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with research focus on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and modern academic history. Email: wen_qing_xin@163.com

学界对鲁迅的小说创作思想的探讨,相关著述已是汗牛充栋。其中,不少学者已注意揭示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与其小说创作的关系,如聂石樵《鲁迅的小说和〈儒林外史〉》云:“熟知鲁迅小说

的人,往往会发现它在内容上、手法上和人物描写上,都深深地受有《儒林外史》的影响,有许多与《儒林外史》相似的地方,同时地表现了与《儒林外史》鲜明不同的特色。这正是鲁迅创造地继承

我国古典文学优良传统的结果”(聂石樵 174)。但此类研究主要集中于揭示鲁迅的小说史研究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而鲁迅的小说创作思想对其小说史研究的影响亦不容忽视。遗憾的是,罕有学者深入述及此意。陈平原曾说:“鲁迅的小说史研究之所以能够深入,得益于其丰富的小说创作经验。以一位小说大家的艺术眼光,来阅读、品味、评价以往时代的小说,自然会有许多精到之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难以逾越,在其史识及其艺术感觉”(陈平原 81)。这是很有道理的,但陈氏亦未曾深入展开。笔者曾撰文指出《中国小说史略》由单列“谴责小说”到“谴责小说”与“讽刺小说”并列、且褒“讽刺小说”而贬“谴责小说”的重要原因之一,与鲁迅在小说、杂文创作中推崇讽刺类作品的行为、推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的思想有很大关系。^①这足以表明鲁迅的文学创作已深入影响其小说史研究。对此,全面探讨鲁迅的小说创作思想如何影响其小说史研究,颇为迫切。

“立人”的创作思想与《史略》之编纂目的

建构古代小说的发展史迹不仅要有宏观的框架体系,亦需对具体的小说作品有深邃的领悟力、评判力等“史识”。建构过程中,不仅需对小说进行版本、作者或文献记载的考据,亦含有对某个时代、某种小说类型或具体的小说文本作诸如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的评鹭。这不仅需要“史”的标准,亦含有文学的标准。史迹的勾勒、版本或文献的考据有对错之别、定鼎之势,而文学的或艺术的评鹭却是人言殊异、见仁见智。鲁迅《题记一篇》(1932年7月3日)论及中西文学评论著述时说:“篇章既富,评鹭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所惜既局于地,复限于时,后贤补苴,竞标颖异,积鸿文于书帙,嗟白首而难测,倘无要略,孰识青英矣”(鲁迅,第8卷370)。亦承认评鹭作品有时、地之限,亦有遗珠之恨,故《文心》《诗学》等虽贵为中西评鹭之“楷式”,亦不免于“后贤补苴”。可见,探讨《史略》文学的或艺术的论断之下定缘由,分析《史略》评鹭古代小说之文学的或艺术的标准及对古代小说演进规律的设定缘由,而非一味鄙薄其见之优劣得失,

则是评判此类论断之学理原则,亦符合鲁迅本意。

有效了解鲁迅的小说创作思想之材料,莫过于《〈呐喊〉自序》(1922年12月3日)与《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3月5日)两文。《〈呐喊〉自序》曾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第1卷437—41)。将改造国民落后愚昧的精神现状寄希望于文艺创作。可见,“立人”思想是鲁迅进行文艺创作的基本出发点及落脚点。所谓“立人”,《文化偏执论》(1907年)云:“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又说:“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历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鲁迅,第1卷55—57)。知其以为张扬国家民族之首务在于“立人”、进而“立国”。可见,“尊个性而张精神”作为“立人”的主要内容,其必然要肯定有利此举之种种,而批判阻碍“张精神”之事物,这与《〈呐喊〉自序》所言相一致。鲁迅选择以小说创作以践行“立人”启蒙之图的缘由,即如《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所言:“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鲁迅,第4卷525)。钱理群认为鲁迅以小说这种不并“文苑”之列的边缘文体为推进工具,是鲁迅一贯坚持边缘性、反叛性及异质性的表现,“他对于正统的‘文苑’体制甚至有一种出于本能的抵制与排斥”,与其对杂文的选择一样,选择之初并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钱理群 111)。更进一步讲,鲁迅此举与小说于晚清地位上升、成为“开民智”之普遍举动,的社会背景亦有莫大关联。也就是说,鲁迅选择创作小说以“立人”伊始,已赋予小说这种文体以特殊的功用意图,即启蒙民众愚昧的精神。这种思想在其所创作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又说:当时的“中国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又过于“自命不凡”,因而“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

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又说:“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鲁迅,第4卷 525—28)。既然鲁迅批判将小说作“闲书”之举,即是期望赋予小说以某种深刻思想内涵的特质;而当时的“批评界”比“创作界”来得“幼稚”,则其在创作小说过程中的努力之举,更应在小说“批评”时加以显力。可见,鲁迅于此文所言自小说创作至小说评论,其目的皆是为“改良社会”“为人生”。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的想法当然包含汲起古典小说中含有“改良社会”之相关成分。鲁迅曾于《古小说钩沉》(1912年2月)说到:“况乃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出于造作,则思士之结想。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鲁迅,第10卷3)。知其在收集整理古代小说文献之初就已意识到古代小说在“丽尔文明”“广视听”之外的教育意义的重要性,此为鲁迅于其小说创作中寓以“国民性批判”思想之典型反应。其所进行的“国民性批判”即是对阻碍“立人”目的之种种事物的代表性特征的抨击。因而,鲁迅最初以小说创作、小说研究进行“立人”目的,往往通过“国民性批判”及批判阻碍此举的种种事物、现象以实现的。

在《史略》中,“立人”思想是如何成为鲁迅编纂意图的基点呢?这就涉及《史略》编纂时所采取的行文策略——其并非将古代小说当作纯粹的文学作品,而是赋予小说文本以社会批评的价值。储大泓《读〈中国小说史略〉札记》曾说:“鲁迅往往透过文艺小说看当时社会,把小说作为历史来读,作为用文艺形式反映社会历史的作品来读。因而使我们通过对小说的分析,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阶级关系等有更深刻具体的了解。把小说作为历史现象来分析,这是鲁迅的《小说史略》的一大特色”(储大泓 84)。甚是。把小说作为历史现象来分析之编纂特色促使其更关注小说作品反映社会内容之一面,以作正面的启迪或反面的教材之用。这种评判重点之根由恰是鲁迅欲以此践行“立人”思想的典型表现。如其评《儒林外史》为:“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撻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案:本文所引《史略》,均据北新书局1927

年版,不再一一注明)。所谓“指撻时弊”即指向此书的价值意义,故以为“《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或廋词隐语寓其姓名,若参以雍乾间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此外刻划伪妄之处尚多,掊击习俗者亦屡见。”又如,评《野叟曝言》时云:“意既夸诞,文复无味,殊不足以称艺文,但欲知当时所谓‘理学家’之心理,则于中颇可考见。”等等。这种情形从对《汉书》所载“王者欲知里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之“小说”的关注,到阐述《世说新语》所载与当时政治背景、玄学思潮的关系,再到肯定《东城老父传》等写当时社会现象的“唐人传奇”而薄宋人“传奇”不敢言时事、多含封建说教语,上再到批评《三国演义》对曹操等人物的塑造有违历史真实,到《红楼梦》对封建社会大家族衰败现象的揭露、《儒林外史》指撻时弊的批判意义、《野叟曝言》描绘清代“理学家”的心理状况,涵盖古代小说演变历程中的绝大部分时期;其对古代小说演变历程中反映当时社会现象、政治生活的描写所持或肯定或批判的态度,批判造成民众愚昧精神的事物(如含封建说教的小说作品),肯定正面撰写时事以示造成彼时多含违碍“立人”事物之因由,进而于《史略》中进行“国民性批判”。上述诸举的背后意图即为“立人”思想。

现试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明之神魔小说”等篇对鬼神妖怪之说的批判为例,以申说“立人”思想如何成为《史略》编纂之价值判断的主导。《热风(三十三则)》(写于1918年,1925年9月24日补记)对盛行于彼时社会之好“鬼话”反“科学”(认为科学害了人),及对俞复《灵学杂志》“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鬼神为道德根本”等现象给予猛烈抨击;认为自维新以来,“儒道诸公”皆将一切社会恶果归结为科学所带来的弊端,使得“社会上罩满了妖气”,并认为能救国的“只有是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要求对国人进行“精神的改造”(鲁迅,第1卷314)。在鲁迅看来,鬼神思想及表现此类思想的文艺容易扰乱人心,是“立人”的主要阻碍对象,更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反面教材。这说明鲁迅对鬼神之说的批判一直与其所主张据“国民性批判”以“立人”的思想相联系。《热风(三十八则)》又说:“昏乱的祖先养出混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

的。”“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混乱的事物(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黯淡”(鲁迅,第1卷329页)。鲁迅认为扫除混乱的障碍主要是“昏乱的心思”与“昏乱的事物”,清除掉扰乱人心的“昏乱的事物”即有改变国民性之可能。《二心集·习惯与改革》(1930年2月22日)亦云:“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至于几个人在书房里相互叹赏,得些自己满足”(鲁迅,第4卷228—29)。这种论断与《史略》抨击“神魔小说”毒害人心——“其力之及于人心者甚大”,不利“国民性”改造之举动,并无二致。鬼神之说由于历来即受市井细民所爱,尤能致“昏乱的心思”,而“神魔小说”则是扰心的“昏乱的事物”——集中表现则是《史略》对描写鬼神之小说的“消遣”意味的否定。又如第十二篇“宋之话本”论述时批判“话本”之“娱心”“劝善”等弊病,评《京本通俗小说》亦言:“其取材多在近时,或采之他种说部,主在娱心,而杂以惩劝。”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中,曾对“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的十八世纪的美国小说,表示相当程度的反感;又批判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与社会世纪没有太大关联:“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可见鲁迅向来十分排斥对脱离社会实际的“消遣”性作品(鲁迅,第7卷115—25)。因为这类作品有碍人“心”的教化,而国民性则根植于人之“心”。从这个意义讲,《史略》关注此类小说“但为人民间巷间意”“偶杂游词,以增笑乐”之“消遣”性,概系此类作品不仅有迎合媚悦大众之嫌,更会阻碍人之“心”的净化,从而最终阻碍“立人”的进行。

从鲁迅于1920年至1923年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世界语学校等处的授课情形看,亦可见及“立人”意图。冯至《鲁迅在北大讲课的情景》曾说:“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冯至198)。观察之目的即为“对社会的批判”,“文艺理论的探索”反倒是其次。许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载:“一九二〇年冬开始,我在北京大学

旁听。鲁迅先生讲的是《中国小说史》,实际是宣传反封建思想,随时讲些做法。像讲《儒林外史》时讲些讽刺的笔法,讲《水浒》时重于个性刻画”(孙伏园 许钦文等84)。“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宣传反封建思想”等评价是符合鲁迅编纂《史略》之初衷的。又,尚钺《怀念鲁迅先生》云:“我一直这样听了先生三年讲授的。这中间,从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和《苦闷的象征》中,我却获得了以后求学和做人的宝贵的教育。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先生给了我对社会和文学的认识上一种严格的历史观念,使我了解了每本著作不是一种平面的叙述,而是某个立体社会的真实批评,建立了我此后写作的基础与方向。”^③可见,储大泓指出《史略》赋予“小说文本以社会批评的价值”之说法符合鲁迅授课时的本意。而鲁迅授课所采取的幽默风趣、深入浅出而娓娓道来的方式,无疑更能加深学生对“立人”意图的接受。据荆有麟《鲁迅回忆断片》(1942年,荆氏曾于1924年在世界语学校听过鲁迅授《史略》,后与鲁迅交往频繁)言:“记得先生上课时,一进门,声音立刻寂静了,青年们将眼睛死盯住先生,先是一阵微笑,接着先生便念出讲义上的页数,马上开始讲起来,滔滔如瀑布,每一个问题的起源,经过,及先生个人对此的特殊意见。先生又善用幽默的语调,讲不到二十分钟,总会听见一次轰笑,先生有时笑,有时并不笑,仍在继续往下讲。”又说:“时间虽然长(先生授课,两小时排在一起继续讲两个钟头,中间不下堂)些,而听的人,却像入了魔一般。随着先生的语句,的思想,走向另一个境界中了。要不是先生为疏散听者的脑筋,突然讲出幽默话来,使大家轰然一笑,恐怕听的人,会忘记了自己是在课堂上的,而先生在中国历史人物中,特别佩服曹操,就都是在讲授时候,以幽默口吻送出的。”^④

可见,从鲁迅整理古代小说文献之初到具体编纂《史略》、再到其授课意图及效果,均可证明其借“国民性批判”的视角确立“立人”思想以主导《史略》编纂之意图。这与晚清以降将小说当作“开民智”、推动社会及政治变革的寄托载体时所赋予的诸多功用是一脉相承的(吴康24—30)。据此,鲁迅的小说创作思想与《史略》的编纂是相通的。从鲁迅最初创作小说之指导思想及文学观看,其后来对《史略》的编纂便是将此类思想予以系统化、理论化,以寻求古代小说的渊源

蕴藉。

“为人生”文学观与《史略》对 古代小说演进规律的设定

虽然学界对《史略》设定古代小说之演进规律的讨论已有不少成果,但仍未有研究者注意到鲁迅的小说创作思想对其设定古代小说演进规律的影响。鲁迅的小说创作思想对编纂《史略》所产生的影响,除上文所举对鬼神妖怪之说的批判之外,“为人生”文学观与《史略》对古代小说演进规律的设定,将这种影响揭示得更明显。鲁迅《我怎样做起小说来》回顾自己的小说创作时,曾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其所主张的“为人生”文学观是采取“国民性批判”的方式以实现“立人”目的为思想基础的(说详上),一直贯穿于其文学创作始末,早在其编纂《史略》之前就已存在(我们暂不讨论这种文学观与陈独秀所谓“写实文学”“平民文学”,周作人“人的文学”及“文学研究会”所提出的“为人生而艺术”等主张的异同)。而践行“国民性批判”“立人”及“为人生”等思想主张的有效工具则是文艺(创作),《论睁了眼》(1925年7月22日)曾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第1卷254)。在鲁迅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其从“为人生”出发,创作了诸如《呐喊》《彷徨》等反对封建礼教、要求个性解放的大量文艺作品,赋予“为人生”的文学观以特定内涵——主张文学创作应该表现现实的人生,具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反抗斗争精神及“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的破坏革新精神。(《摩罗诗力说》)(鲁迅,第1卷80—87)故《论睁了眼》认为:“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又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后,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敏锐地揭露国人“不敢正视人生”的缺陷,才导致“瞒和骗”的弱性,进而产生“瞒和骗的文艺”;因而鲁迅最终得出“用以欺瞒的心,用欺瞒

的嘴”说出来的话只能是虚假的,“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鲁迅,第1卷251—54)的结论。虽然鲁迅后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观及世界观,对“为人生”文学观有新的思考,但从其编纂及修改《史略》等情形看,“为人生”文学观对《史略》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其早期的探索。受“立人”意图及“为人生”文学观的早期探索之双重作用,此时期的鲁迅进行文学创作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文学创作应以表现人、书写人生为中心,从而挖掘人的精神价值。如《祝福》通过祥林嫂的悲惨遭遇,使读者得以看到朴实、顽强、深信通过自己的勤劳可以过上幸福生活的祥林嫂是如何在封建君、神、族、夫的多重压迫中痛苦死去,以见悲剧的社会现实对人的精神的摧残。二是,文学创作还应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发挥批判社会、改良人生的战斗作用,以获得新生的希望,达到实现“国民性改造”与“立人”意图。^⑤

将“为人生”文学观与《史略》的编纂及具体论断相比照,可知此类文学观对《史略》所产生的影响。第二篇“神话与传说”云:“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而由于天授,或有天相者,简狄吞燕卵而生商,刘媪得交龙而孕季,皆其例也。”《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从神话到神仙传》亦云:“从神话演进,故事渐近于人性,出现的大抵是‘半神’,如说古来建大功的英雄,其才能在凡人以上,由于天授的就是”(鲁迅,第9卷312)。其对古代小说起源于神话与传说的探讨重点皆是落在“人”“人性”上。鲁迅是“进化论”笃信者,《史略》以此作为编纂的主导思想之一。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其认为古代小说发展历程应是不断进化的;而从“为人生”文学观出发,这种进化一定要落实到“人”的进化上,即小说描写客体应由物及人、并最终向“人性”之一面延伸。由此,《史略》确定古代小说演进的第一条规律,即探讨小说的起源及其早期演变时确立由写神的向写人的演进、渐至反映人性之规律。^⑥但《史略》对此规律的揭示并非集中讨论古代小说写神鬼之情形、或由写神如何向写人的过渡过程,而是以写神鬼(如对《山海经》的探讨)为跳板,积功讨论“人”在古代小说演进历程中的重要性。其讨论

具体作品时,语虽稍涉神鬼、或异物的描写,最终落脚点仍在“人”上,典型者如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称《聊斋志异》为:“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关注人格化的物态描写。此论向为研究者所珍视,但鲁迅此论仅仅反映古代神怪小说发展的一方面——古代神话关注的重点是“外物”,并非全是“神”。古人认为:“怪,首先是物;只是对于人来说,它们是异己的物,不熟悉、不了解之物,由于基于‘怪异’即‘神奇’的心理,方将它们当作了‘神’。”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神怪小说的灵魂。“神怪”观念产生的途径主要包含从“物”到“神”与从“人”到“神”两种;当“怪”之于“物”则侧重表现为“异形”,当“怪”之于“人”则侧重表现为“异秉”。而“怪”“物”与“我”三者融通的可能性,即如郭璞注解《山海经》所言:“世之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谓不异,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⑦故鲁迅认为“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凡所叙述,今谓之传说”的基本论点本身就有问题。同时,物与物之间的转化是这类小说演进的另一主流;而《史略》认为古代小说的演进历程应最终导向“人”,这就将演进过程中的其他实情排斥。造成此举之由,在于其认为古代小说的终极价值仍须回归“为人生”,纯粹描写物性的小说是无太多价值的。这就是第二十二篇以“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等语否定明末志怪群书、而肯定《聊斋志异》由写物性向表现人性演进具备开创性的根本原因。

而《史略》所确定的由无意为小说向有意为小说演进之另一规律,则强调作为创作主体的“人”对古代小说演进的重要性——既然文学创作应表现现实的人生、以书写人生为中心,那么,文学的进化就应该向书写人生之一面靠拢,创作主体自觉以此作为小说书写的主要内容之举,就尤当值得肯定。(鲁迅曾提出“文学自觉”说,是就文学演进过程中的文学作品应充分体现文学的艺术性而言。这与此处从创作主体与书写内容探

讨文学演进规律并不冲突。唯系讨论视角有异,实质皆是探讨如何建构文学史的演进规律。)故《史略》提出创作主体“有意为之”之规律,实为强调在古代小说演进史上,以“人”(包含作品描写与创作主体)、书写“人生”为主题的轴心应成为小说演进史迹的主导。因而,鲁迅认为小说作家在作品中从无意识书写“人生”到有意书写的转变过程,明清小说尤其是广泛地、深入地有意去书写“人生”,就是演进过程中的一大进步。(说详下。)这就是“唐人传奇”广受《史略》推崇的最根本原因。虽然《史略》也提到魏晋志怪与志人小说已出现“有意为之”的倾向,但在鲁迅看来,此时期的小说书写主题并非围绕“人”及“人性”,创作主体尚未自觉地去全方位、深入书写“人”及“人性”的主题。而“唐人传奇”被其视为创作主体自觉表现“为人生”之主题的开端,“文情活泼”,具有书写时事、改良人生的战斗作用。在鲁迅看来,唐以降的小说创作主体表现“为人生”意识的自觉化、普遍化,给小说作品在挖掘人的精神价值、揭露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等方面以巨大的展示空间,从而符合其所欲借“国民性改造”达到“立人”目的之先行设定的批评观念。总之,由写神的向写人的演进之确立是鲁迅从小说客体的描写对象切入,由无意为小说向有意为小说演进之规律的确立则着眼于创作主体方面。这两方面最终形成鲁迅对古代小说演进过程中如何表现“为人生”文学观的书写局面的认识。可见,“为人生”的文学观对其“小说史观”产生了重要影响。故而探讨进化论等文艺理论对建构《史略》的影响时,^⑧还应注意到鲁迅对进化论的借鉴实是为“为人生”文学观服务的,进化论作为一种方法论以建构《史略》是有条件限制的——其论断评定出发点及旨归,均是“为人生”。同时,学界论“唐人传奇”之“有意为小说”时,均以为是鲁迅对小说发展进程中创作主体对文体之艺术觉醒的讨论^⑨。而鲁迅所主张的“为人生”文学观首先界定其对文学对象、文学创作之功用及文学史之建构目的等方面的讨论范围,所提出的“唐人传奇”虽含有一定的文体意识,但“有意为小说”的提法并非完全属于文体判断,而是基于对创作主体自觉地书写“为人生”文学观的表现程度多寡而言。故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云:“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

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肯定唐人小说荡涤伪饰陋习、并非“作了封建说教的奴隶”的文艺而有异趣。所谓“意想”即料想、想象之意,如评沈既济《枕中记》所言:“如是意想,在歆慕功名之唐代,虽诡幻动人,而亦非出于独创,干宝《搜神记》有焦湖庙祝以玉枕使杨林入梦事,大旨悉同,当即此篇所本。”第二十五篇“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评《野叟曝言》云:“凡人臣荣显之事,为士人意想所能及者,此书几毕载矣,惟尚不敢希帝王。”可资佐证。“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云云,则为强调创作主体在表达、描写“人的精神”(即创作主体的“意想”)方面较于先前的突破之举,具有创作者独特的人格感染力——《热风(四十三)》曾说:“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市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鲁迅,第1卷346)。可知鲁迅要求艺术创作应该含有创作者的人格精神,文学创作亦不能例外。唯有此,通过文学作品的描绘及创作者的人格精神的感化与干预,文学创作方可达到改造国民性及“立人”之目的。从这个角度讲,鲁迅认为唐人小说“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具有创作主体之人格精神,故极具进化意义。明乎此,不少学者沿着鲁迅所提出的“有意为小说”之思路,以争论古代小说“有意为之”之肇端始于魏晋或唐代之类的讨论,意义或许不大。

《史略》将唐人小说确定为“有意为小说”之肇始,尔后对宋元明清时期的小说演进的探讨,一方面仍延续对诸如讲史小说、人情小说、侠义公案小说等各种类型“有意为之”之情形的探讨,另一方面则是在解决“为人生”文学观于古代小说演进历程中的存在可能之后,转而重点探讨此时期的小说演进过程中,“为人生”文学观如何在“有意为之”的情况下被广泛书写、书写到何程度。这就涉及对“为人生”文学观所要求的创作主体及作品描写在挖掘人的精神价值、反抗压迫及写实性等方面的探讨。这些方面的探讨是《史略》在依照元明清小说演进实情而进行篇目编纂之外,评判此时期小说的思想内容、艺术内涵进化与否的主要标准。除上文所举对“讽刺小说”的论述,又如对人情小说的探讨,《史略》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说”谈及《红楼梦》续作时,认为此类续作“大率承高鹗续书而更补其缺陷,结以‘团圆’”“此足见人之度量相去之远,亦遭雪芹之所以不可及也”;《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唐之传奇文》论述元明所作之董《西厢》、王《西厢》等作品将唐人小说《莺莺传》之结局向“团圆”靠拢时,说:“这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它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瞒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底问题”(鲁迅,第9卷326)。此类论断即是其对以“团圆”结局之“瞒和骗”的作品加以批判的具体表现(说详上)。这种“瞒和骗”的文艺源于“瞒和骗”的国民性,是不具备反抗精神的。而与“瞒和骗”的“国民性”及其所产生的文艺相对应的是,鲁迅甚是欣赏古代文学中求真写实的作品,故肯定《红楼梦》:“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更是进一步发挥到:“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第9卷348)。《红楼梦》打破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是出现“新文艺”的表现,方可对“国民精神”进行引导。而早在油印讲义稿《小说史大略》中,鲁迅就盛赞《红楼梦》的作者是“知人性之深,得忠恕之道”,^⑩从人性角度考虑作品的价值,就是对“为人生”文学观的最主要诠释。又如,《史略》专列“宋元之拟话本”“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清之拟晋唐小说”等篇以探讨古代小说演进过程中的“拟作论”现象时,评“拟话本”之《宣和遗事》为:“虽亦有词有说,而非全出于说话人,乃作者掇拾故书,益以小说,补缀连篇,勉成一书,故形式仅存,而精采遂逊,文辞又多非己出,不足以云创作也。”评“拟宋市人小说”为:“宋市人小说,虽亦间参训喻,然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用以娱心,及明人拟作末流,乃诤诫连篇,喧而夺主,且多艳称荣遇,回护士人,故形式仅存而精神与宋迥异矣。”评“拟晋唐小说”之《阅微

草堂笔记》为：“虽‘聊以遣日’之书，而立法甚严，举其体要，则在尚质黜华，追踪晋宋。”“与《聊斋》之取法传奇者涂径自殊，然较以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偏于论议。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即与晋宋志怪精神，自然揆隔；且末流加厉，易堕为因果报应之谈也。”对“拟作”仅承继所拟对象之形式而“精神”不及等情形予以否定。据上引，鲁迅认为赋予小说作品以某时代的特定“精神”或创作主体的“人格”，使得作品具有强烈感染力，符合“为人生”之要求，故能达到“立人”目的。这在第二十七篇“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论《三侠五义》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时去明亡已久远，说书之地又为北京，其先又屡平内乱，游民辄以从军得功名，归耀其乡里，亦甚动野人歆羨，故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乐为臣仆”云云即是批评清之侠义小说所写有违“为人生”之精神实质，不如《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之深刻。据此，《史略》评价《水浒传》《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云云，则是“为人生”文学观延展的结果——在鲁迅所创作的小说作品中，其借助对人、“人心”进行深入而全面地挖掘，以证明通过小说作品如何进行“国民性批评”、达到“立人”目的及实现其“为人生”的文学观，学界对此已有定论。可见，以“为人生”文学观作为评判元明清小说演进的支点，涵盖讲史小说、人情小说、侠义及公案小说、讽刺小说、“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谴责小说、“拟作”现象等绝大部分小说类型。“为人生”文学观不仅深刻影响《史略》对古代小说演进规律的设定，且成为鲁迅梳理古代小说演进历程、评判具体小说作品的潜在价值标准。可以说，《史略》除了对小说作家生平与交友、版本概况及相关史料的稽考外，有关古代小说之思想性论断、艺术性评判等评鹭，大多受“为人生”文学观的支配，从而建立《史略》独特的评价体系。

注释[Notes]

① 案，1920年与1921年刊发的油印讲义稿《小说史大略》（鲁迅于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处授课时由北大国文系教授会随课陆续印发），仅专论讽刺小

说，尚未提出谴责小说的文类概念。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刊发的《中国小说史大略》则明确提出谴责小说的文类概念，并形成讽刺小说、谴责小说骊道并驱，且以褒讽刺小说而贬谴责小说为主的论述体系。这种做法不仅受鲁迅“领袖欲旺盛”“太易流于感情之论”等文人习气的影响，带有浓厚的“个人的批评”色彩。而且，鲁迅褒讽刺小说的做法与其推崇讽刺作品的文学创作行为有关，是其为破除彼时社会有关讽刺作品的偏见、寻求历史渊源的支撑而对讽刺作品进行正名之目的使然。参见拙稿《鲁迅的“文人习气”、杂文创作与学术研究——以〈中国小说史略〉名类讽刺小说与谴责小说为中心》（《中国文学研究》即刊。）

②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曾回忆鲁迅批评“宋人传奇”之由在于：“（一）多含封建说教语，则不是好的小说，因为文艺作了封建说教的奴隶了；（二）宋传奇又多言古代事，文情不活泼，失于平板，对时事又不敢言，因忌讳太多，不如唐之传奇多谈时事。”参见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1111。

③ 参见彭定安、马蹄疾：《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上）》（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343。

④ 参见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140—41。

⑤ 参见温庆新：“近现代尚鬼神妖怪之风、‘国民性批判’与《中国小说史略》——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明之神魔小说’为例（下）”，《上海鲁迅研究》1（2013）：78—93。

⑥ 钟敬文《中国民间文学讲演集》曾指出《史略》“神话与传说”篇所谓“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之定义，参考了日本近代神话学开山祖师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的说法；而有关神话与传说递变的说法，即自“迨神话演进，则为中枢者渐近于人性”至“皆其例也”所言，则参考德国马克斯·缪勒的主张。（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247—48。虽说鲁迅最初借鉴高木敏雄、马克斯·缪勒等观点，这与鲁迅当时所接触的信息量及高、马二氏的权威研究有关，但高、马二氏对神话与传说向人性演变的某些论断，符合鲁迅所坚持的“为人生”文学观的设定，此即鲁迅予以借鉴的最根本原因。参见温庆新：“中国小说起源于‘神话与传说’辨正——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5（2014）：134—41。

⑦ 关于明代神怪类小说的兴盛及其过程的探讨，是以“神魔小说”名类贴切，还是以“神怪小说”名类适合？这个问题涉及到古人对“神”“怪”及“神怪”观念的理解。参见温庆新：“对‘神魔小说’文体研究的质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10）：94—98。

⑧ 参见宋克夫、张蔚：“进化论与《中国小说史略》”，《明

清小说研究》1(2006): 8—26。鲍国华:“进化与反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进化史观”,《东方论坛》2(2009): 62—66。等等。

⑨ 如王枝忠《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曾说:“我以为,唐人自觉地把传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来认识,注意对生活的剪裁、提炼和加工改造,这就是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全部内涵,这才是关于这句话的全面正确的解释。”见《社会科学研究》6(1985): 76。何满子《释“有意为小说”》亦云:“作为与‘小说前史’划时代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是创作主体对文体的艺术觉醒。”见《古典文学知识》5(1994): 32。等等。

⑩ 参见鲁迅:《小说史大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99。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Chen, Pingyuan. “Lu Xun as a literary historian.” *Modernity Process in Chinese Literary Research*.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储大泓:《读〈中国小说史略〉札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Chu, Dahong. *Reading Notes on Lu Xun's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1981.]

冯至:“笑谈虎尾记犹新”,《冯至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Feng, Zhi. “My Fresh Memories of Lu Xun.” *Complete Works of Feng Zhi*. Vol. 4.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1999.]

聂石樵:“鲁迅的小说和《儒林外史》”,《纪年鲁迅诞辰百周年文学论文集及鲁迅珍藏有关北师大史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

[Nie, Shiqia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Xun's Novels

and Wu Jingzhi's *The Scholars*.” *Critical Essays at the Centenary of Lu Xun*.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1.]

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Lu Xun.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1958.]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Qian, Liqun. *Encountering Lu Xun: Lectur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2003.]

孙伏园 许钦文等:《鲁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Sun, Fuyuan and Xu Qinwen, et al. *Memoirs about Lu Xun*.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0.]

温庆新:“近现代尚鬼神妖怪之风、‘国民性批判’与《中国小说史略》——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明之神魔小说’为例(下)”,《上海鲁迅研究》1(2013): 78—93。

[Wen, Qingxin. “Obsession with the Monsters, National Critique and A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Lu Xun Research in Shanghai* 1(2013): 78—93.]

——:“对‘神魔小说’文体研究的质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10): 94—98。

[——. “Questioning on the Generic Studies of ‘Monster Stories’.”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5(2010): 94—98.]

吴康:“民国检查制度与古代‘文字狱’——鲁迅杂文研究之三”,《中国文学研究》1(2009): 24—30。

[Wu, Kang. “Censorship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Literary Inquisition in Ancient China: A Study of Lu Xun's Essays.”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1(2009): 24—30.]

(责任编辑:王峰)